国际战略研究简报
International and Strategic Studies Report
第74期
2012年11月23日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办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nd Strategic Studies, Peking University

观察中国观察者

——解构西方的中国威胁论和机遇论

澳大利亚迪肯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高级讲师　潘成鑫

意大利诗人但丁曾说过："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这大致可以概括中国近几十年来的发展经历：即坚持以我为主、脚踏实地、善于守拙、不搞争论，通过改革开放而致力于经济社会发展。但与此同时，西方对中国崛起的议论则有愈演愈烈之势。今天，中国还能否继续采取"让别人去说吧"的态度呢？有人也许认为别人怎么看中国是他们的事，中国既无暇顾忌，又鞭长莫及。而且国际上的街谈巷议大多有口无心，中国大可不必太当真。

这些认识虽不无道理，但也有可商榷之处。当今中国已不是仅仅在走"自己"的路，而早已走出国门，涉足世界，因此，来自各个角落对中国的热议，直接关系到中国未来的发展和战略应对。本来说与做就不可分割。建构主义强调话语的作用，认为通过对行为的规范和支配，话语可以改变和建构现实。当前，很多人十分关注美国的重返亚太战略，但仅仅着眼于战略层面难免有失偏颇，因为这一战略的背后离不开西方尤其是美国对中国的种种观念和说法。

国外对中国可谓众说纷纭：威胁论、机遇论、责任论、崩溃论、模式论等等，不一而足。但归根到底，影响最大的还是威胁论和机遇论，所以这里主要就这两种看法作简要分析。

中国大多数人比较认同机遇论，并认为威胁论是西方冷战思维的体现。但是

我们很少思考为什么西方的这两种思维模式常常并存和根深蒂固？即使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很长一段时间，将中国看作“威胁”或“机遇”的也大有人在：从“黄祸”到邪恶的“傅满洲博士”，从传教士的“希望之地”到西方商人眼中的“四亿顾客”，中国似乎始终在“威胁”和“机遇”之间徘徊，以至于有人称之为西方的一种钟摆式的爱恨情结。

我认为，西方关于中国“威胁”和“机遇”的观察反映的主要不是中国是什么，而是西方自身。这里涉及社会话语的自传性特征。所谓自传性，是指一种社会话语表面上是在描述其他对象或现象，但字里行间却是对描述者自身的一种表述和构建，在此过程中描述者有意无意地成为其看待其他事物的参照系。正如《犹太法典》所言：“我们怎么看别的东西不取决于那些东西是什么，而是根据我们自己是什么。”萨义德和很多人类学家都曾对社会话语的这种自传特性做过阐述。

那么威胁论和机遇论反映了西方自身的什么特征呢？当然，西方会认为“威胁”或“机遇”确实反映了中国的客观现实，并非是西方的主观意志。但是，恰恰如此，“客观现实”正好暗示着西方观察者是什么：能够接近“客观现实”的人当然是理性和权威的认知主体。其实这一隐性的自我表述正与西方长期以来对自身的现代认同一脉相承。虽然“西方”这一概念过于宽泛，但在现代认同的层面确有其共同之处。

现代史上西方对现代性的发现其实是对自身的发现。现代人的理性、自由和对客观确定性的追求，反映了西方随着启蒙运动、科学和工业革命对自身发展的信心。科学和地理大发现使得西方确信世界的科学奥秘是最终可以被理性所揭示的。随着自然科学不断取得进展，西方社会科学也坚信人类社会存在着客观的、确定不变的规律。主流国际关系学深受这种实证科学思潮的影响，并以发掘国际关系中的客观事实为己任。但至少在社会层面上，这种所谓的客观确定性是不存在的，或只是暂时的、有条件的。可是如果西方承认确定性的虚无，就无异于对自身作为理性认知主体的质疑，正如安徒生童话中对“皇帝新装”的否定等于是对两个自诩的“织工”的揭穿。所以，不确定性始终是悬在现代西方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和所谓的笛卡儿式焦虑的焦点。

如何解释并消除不确定性便成为西方现代社会发展以及对外战略中的一项核心议程。随着苏联的解体，学者和战略分析家曾各显神通，提供冷战后新的确定性，例如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米尔斯海默的“回到未来”，福山的“历史的终结”等等。但是，这些确定性所体现的并非确定的事实本身，而是美国哲学家杜威所说的“情感替代品”的产物。他说：“当没有真正的确定性时……人们会想出一切办法来使自己有一种确定的感觉。”这些确定的感觉源于情感替代品。

在社会群体内部，爱和基本信任可以作为不确定性的情感替代品，但它们往往不被适用于他者和“非我族类”。在克服他者的不确定性的过程中存在另外两种常见的情感替代品：恐惧和幻想。前者是对不确定的他者朝最坏处想的心态，而后者则是对不确定性朝好处想的一种情感寄托。

在西方看来，中国是一个典型的不确定因素，缺乏透明、神秘莫测。而对中国不确定性的认知正是由恐惧和幻想来越俎代庖。从恐惧中，中国的不确定性可以被确定为西方所熟悉的威胁；而通过幻想，中国的确定性体现为种种似乎可望又可及的机遇：中国在不久的将来会逐渐实现市场化、民主化、融入国际社会并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诸如此类。如前所述，这些通过恐惧和幻想而得以确定的中国体现的主要不是中国本身，而是西方的自我。归根到底，对中国的恐惧和幻想是对中国将重复西方自我发展模式的一种恐惧和幻想。

在现实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眼中，西方自我作为理性认知主体的发展轨迹不尽相同。现实主义者看到的西方是自私的理性行为主体之间为权力而争斗不休的历史、雅典和斯巴达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十九世纪欧洲的势力均衡、纳粹德国的野心和美国的世界霸权就是明证。现实主义者对中国威胁的恐惧其实是担心中国会重蹈西方国家由权力转移而走向对抗的覆辙。因此，不少学者经常拿二战前德国和美国与现在的中国做类比，其眼中的中国其实更多的是西方自身的投影。米尔斯海默认为如同十九世纪美国开始在西半球称霸一样，中国将同样会寻求地区霸权；类似于美国以门罗主义来排斥欧洲大国对美洲事务的干预，中国也将抛出自己的门罗主义来排斥美国。美国新保守派代表人物罗伯特·卡根也提出：“如果美国人希望理解今天中国的权力和野心，他们可以从自己照镜子着手。”

自由主义者眼中的中国“机遇”也带着明显的西方自身的印迹。当十九世纪英国产业者憧憬着如果每个中国人的长袍都加长一寸、兰卡郡的纺织厂就会忙上一代人时，他们描述的不是中国当时的真实情况，而是他们作为新兴工业国家对开拓海外市场的畅想。这类幻想虽然在当代部分地成为现实，但是那种将中国等同于十亿消费者的看法更多体现的是西方对自己经济活力的一度自信。同时，在西方的话语中，中国机遇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经济的发展将促进中产阶级的壮大，从而推动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和民主化进程。当解释西方为什么津津乐道于中国的民主化和公民社会时，澳大利亚社会学家乔纳森·昂格指出这是因为这些问题正好与西方大多数人的政治愿望相吻合，是他们特想看到一个中国社会正在逐渐地组织起来，并悄悄地侵蚀一个高压国家的权力。

无论是“威胁”还是“机遇”，这些由西方恐惧和幻想而投射到中国身上的观念本身并非问题所在，甚至“恐惧”和“幻想”作为情感替代品也无可厚非。

不可否认，中国的确存在着某种“威胁”和“机遇”，虽然这并不是中国的全部内涵。另外通过“恐惧”和“幻想”来弥补我们对确定性的渴求大概是人类的通病。比如中国也存在着看待其他国家和文化的类似倾向。问题在于很多人把这些情感替代品所衍生的认识作为客观事实而确信不疑，从而丧失对这些认识的自省和批判。在很大程度上，西方对中国的恐惧、幻想和最终的幻灭，加上自身的不自知，是造成西方对中国缺乏战略信任的一个重要因素。当然，这并不是说西方应完全对缺乏战略互信负责任；显然，中国也因恐惧而对西方满腹疑虑，甚至诉诸西方阴谋论。但是，由于目前西方在国际话语权以及国际格局中的主导地位，反思西方仍是当务之急。

首先，当中国威胁论认识不到其恐惧的背景时，它会把中国“威胁”看作一种客观现实而主张对中国加以防范甚至遏制。很多学者都已指出这种理论和实践会促使中国做出相应回应，从而加剧双方的安全困境。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威胁”可能成为一个危险的自我实现的预言。

其次，作为西方的一种幻想，中国“机遇”最终将是一个虚假的诺言，因为中国虽然可以而且正在变革，但其终究无法变得像西方一样，更不会仅仅成为西方的“机遇”。面对这一打击，中国机遇论者由幻想到幻灭的同时，会将“失去的机遇”归咎于中国的顽固不化。一个日益强大而又不按美国和西方意志行事的中国将会被看作一个更加可怕的中国。这种由幻想到恐惧的转变可以说明：为什么现在不少主张对中国强硬的人士并非传统的鹰派，而曾经是中国机遇论者。

反观美国和其他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两边下注（或者对冲）战略，我们从中不难看到这些有关中国主流话语的影子。在某种意义上，两边下注战略正是恐惧和幻想在政策层面上的结合。理解西方和美国对中国的战略走向，从其对中国的话语中可以洞察端倪。战略的要义既在于战略本身，更在于知己知彼。没有话语上的知己知彼，战略可能既是无源之水，又是无的放矢。因此，中国不能只顾走“自己”的路，也需要关注别人怎么说自己；同时保持文化自觉，免受西方恐惧和幻想的影响，并逐步消除以自我和他者的二元对立作为思考中国与世界的出发点。作为对但丁名言的补充，中国应该既埋头拉车，又抬头看路；既耳听八方，又语传四座。

* 作者衷心感谢袁明、朱锋、范士明、王勇、刘海方、吴湘宁等老师的支持和鼓励以及在北大国际战略研究中心金九论坛上各位的评论和建议。

编辑：吴湘宁　审核：王缉思　地址：北京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邮编：100871
网址：www.ciss.pku.edu.cn　电话：86-10-62756530　传真：86-10-62759302
邮件地址：CISS@pku.edu.cn